

##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《千字文》

□ 常荃心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
《千字文》由南朝梁周兴嗣奉梁武帝敕令，用王羲之书写的一千个不重复之字编次而成，四言一句，两句一韵，朗朗上口，集识字教育、书法摹写、编次编号等多种功能为一体，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童蒙教材。敦煌遗书中发现的《千字文》写本数量为各类蒙书之最，据笔者统计涉及《千字文》的敦煌写本有 177 件。这些写本形态各异，不仅有书法精美的真草临本，也有儿童习字的稚嫩抄本，为研究《千字文》在唐五代时期的学习和使用提供了实物证据。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有 35 号《千字文》写本，可分为杂写本、习字本、正式抄本等，以下撮其要者作以介绍。

敦煌《千字文》中有明确纪年和作者的写本较少，目前仅有 4 件正式抄本的题记中有所提及。而国家图书馆藏 BD04083 号背（原编号丽 83）《千字文》为学郎随手写就，虽非正式抄本，但也记有纪年和作者信息，颇为珍贵（图 1）。该件为卷轴装，正面为《因缘心释论开决记》，背面为《千字文》和几处时间地名杂写。所写《千字文》首全尾缺，存有连贯文字 5 行，起于“千字文”，止于“剑号巨阙”，未抄写完，笔法稚嫩。文字中存在一些讹误和脱字现象，如“辰宿列张”中脱一“列”字，“秋收冬藏”写做“秋冬收藏”等。《千字文》之后的杂写有“大唐河西”“大唐中和五年”“大唐河中五年三月十八日沙弥”“沙洲敦煌归义君（军）学士索孝顺”“四月十日灵图”等文字。唐中和五年为公元 885 年，中和五年三月改元为光启元年，但敦煌地处西北，消息较为滞后，仍在沿用中和五年的年号。“灵图”为敦煌当地最大僧寺之一的灵图寺。敦煌地区寺学兴盛，灵图寺就曾举办过寺学教育僧俗生徒。敦煌所出多件蒙书的题记显示为该寺学士郎写就，如：法藏 P.3211 号《千字文》卷末就有记曰：“乾宁三年（896）丙辰岁次二月十九日灵图寺学士郎汜贤信书记”。根据国家图书馆藏 BD04083 号背所反映出的信息，可以看出这件《千字文》为敦煌当地一位名叫索孝顺的学郎写于公元 885 年，并且他很有可能也是灵图寺的学生。其稚嫩的书法笔法和文字讹误也反映出该学郎处于学习《千字文》初级阶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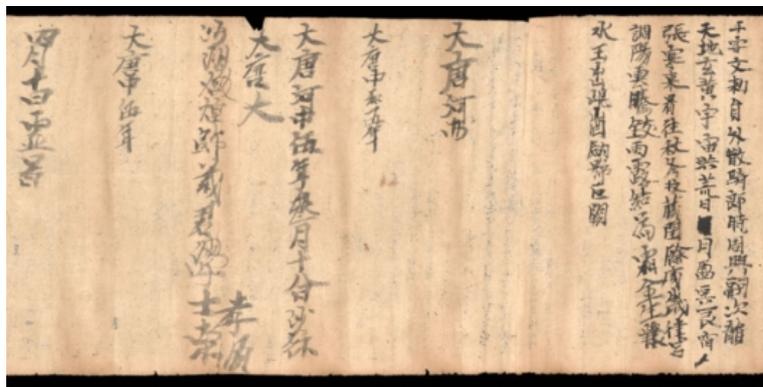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 BD04083V 号

敦煌《千字文》作为学习教材，存有大量习字抄本，这些抄本展示出了敦煌当地学郎学

习《千字文》的过程。最为典型的一件为英藏 S.2703 号，抄有《乾元元年（758）七月史张元贞牒》《天宝八载（749）三月史令狐良嗣牒》等文献，之后抄《千字文》习字 83 行，包括“光、果、珍、柰、李、菜、重、芥、姜、海、咸、腾、致、雨、露、结、为、霜、金、生、丽、水、玉、出、崑、岗”26 字，每字抄 3—4 行；“咸”与“腾”字之间有残缺。在“柰”字前有“廿五日”；“姜”字前有“廿六日”；“腾”字前有“十八日”；“结”前有“十九”日；“生”字前有“廿日”；“出”字前有“廿一日”。在“玉”字之后，有批语“渐有少能，亦合甄赏。休”，且每个日期笔法与批语相同，为当时教师检查学郎作业所写。李正宇先生认为这件文书为学生日课作业，真切地再现了我国古代儿童习字的情状，对探讨古代教育史具有重要价值<sup>①</sup>。国家图书馆藏《千字文》也有一定数量习字抄本，BD09326 号（原编号周 48）为归义军时期写本，卷轴装，首尾均残，两面皆抄有《千字文》习字，正面有界栏，第一横行为范字，横向依次为“张、寒、来、暑、往、秋、冬、藏、润、余”，背面依次为“果、李、柰、菜、珍、重、芥、姜”，每字抄写 4 行（图 2）。BD13187 号（原编号临 3316）也为归义军时期写本，卷轴装，首尾均残，正面存 11 行，抄写“色、胎、厥”三字，每字 4 行，每行在第四字与第五字中间有一行横向圆点断开，圆点之下为先写第一行范字，再竖向临写，每字从圆点下开始临写至第四竖行圆点之上结束；背面存 2 行，抄写“辩、色”二字，为正面包折到背面（图 3）。BD13185 号（原编号临 3314）亦为归义军时期写本，卷轴装，首尾均残，其 B 号背面存有习字 10 行，抄写“鉴、貌、辩”三字，每字亦 4 行，抄写形式与 BD13187 号相同，并可以与 BD13187 号背从正面折包过来的纸张缀接。据张新朋研究，这两件《千字文》与俄藏 DX.1495 号为同一写卷<sup>②</sup>。俄藏 DX.1495 号残片存习字残文 13 行，抄“陵、磨、摩、绛、霄”五字，抄写形式与笔法与 BD13185 号和 BD13187 号如出一辙。通过以上习字本可以看出，敦煌学士郎一般的习字方式为先写好范字，而后每字临写多遍来加强练习。国家图书馆所藏这几件《千字文》习字本笔迹较为灵动，字体结构紧凑且笔锋突出，是具有一定基础的学郎练习书法的作品，别具特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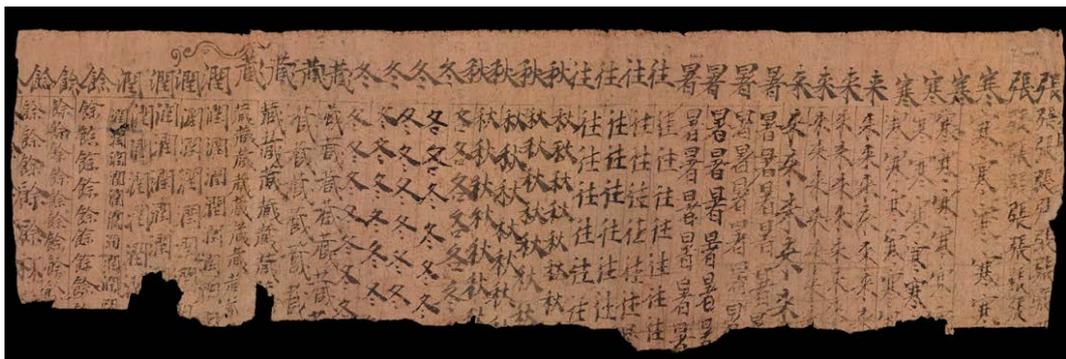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2 BD09326 号

<sup>①</sup> 李正宇：《一件唐代学童的习字作业》，《文物天地》1986 年第 6 期，第 15 页。

<sup>②</sup> 张新朋：《敦煌蒙书残片考》，《文献》2013 年第 5 期，第 75—76 页。



读的注释本。《千字文》作为我国古代最为流行的蒙书，历代均有学者为之作注，但早期注本大多亡佚。如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载梁国子祭酒萧子云注《千字文》和胡肃所注《千字文》都没有发现传世本<sup>①</sup>。但在法藏敦煌遗书 P.2721 号《杂抄》中有：“《千字文》钟繇撰，李暹注，周兴嗣次韵。”可见，在唐五代时期李暹所注《千字文》较为流行，敦煌地区民众广为知晓。敦煌遗书中发现了两件《千字文》注本，分别为英藏 S.5471 号和法藏 P.3973 号，内容起于“为夜光之宝也”，迄于“尺璧非宝”，共有四十一句原文的注释。学者们认为敦煌《千字文》注释本是在李暹注本的基础上有所增删，表现出了敦煌当地的独特性<sup>②</sup>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国家图书馆藏 BD06576 号（原编号淡 76）敦煌遗书也涉及到《千字文》注释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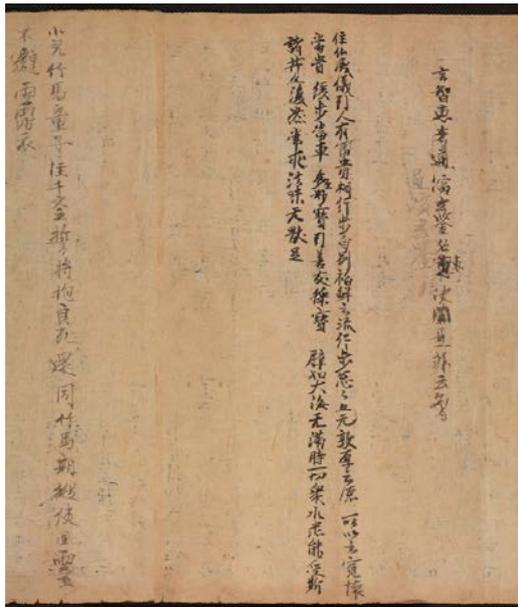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6 BD06576V 号

内容（图 6）。这件敦煌遗书为卷轴装，是吐蕃统治时期写本，其正面为《维摩诘所说经疏》，文字从“佛国品”第一后部分到“弟子品”第三首部；背面文字为正面经疏的补注。其中第 17 处补注文字为：“小儿竹马童子，《注千字文》云：‘誓将抱良（梁）死，还同竹马期，纵使风云至，不避雨沾衣。’”这首“竹马童子”诗为敦煌《千字文》注释本中“信使可覆”句的注释。现存两卷敦煌《千字文》注释本中，S.5471 号写本此诗文残缺较多，仅存首句文字；P.3973 号字迹虽清晰可辨，但存在一定的讹误脱字现象，无法展示此诗原貌。BD06576 号背的《注千字文》的“竹马童子”诗，恰可以补全此诗全部内容，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。

敦煌《千字文》写本是唐代童蒙教育的实物证据，通过对敦煌《千字文》的考察，可以了解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学士郎对《千字文》的学习过程，也反映出了当时童蒙教育在习字方面的具体实践情况。国家图书馆所藏《千字文》写本形态种类较多，颇具特色，体现出了敦煌《千字文》的写本价值。

<sup>①</sup> 《隋书·经籍志》卷三二，中华书局，1975 年，第 942 页。

<sup>②</sup> 张娜丽：《敦煌本〈千字文注〉注解》，《敦煌学辑刊》2002 年第 1 期，第 47 页。郑阿财、朱凤玉：《敦煌蒙书研究》，甘肃教育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27—40 页。